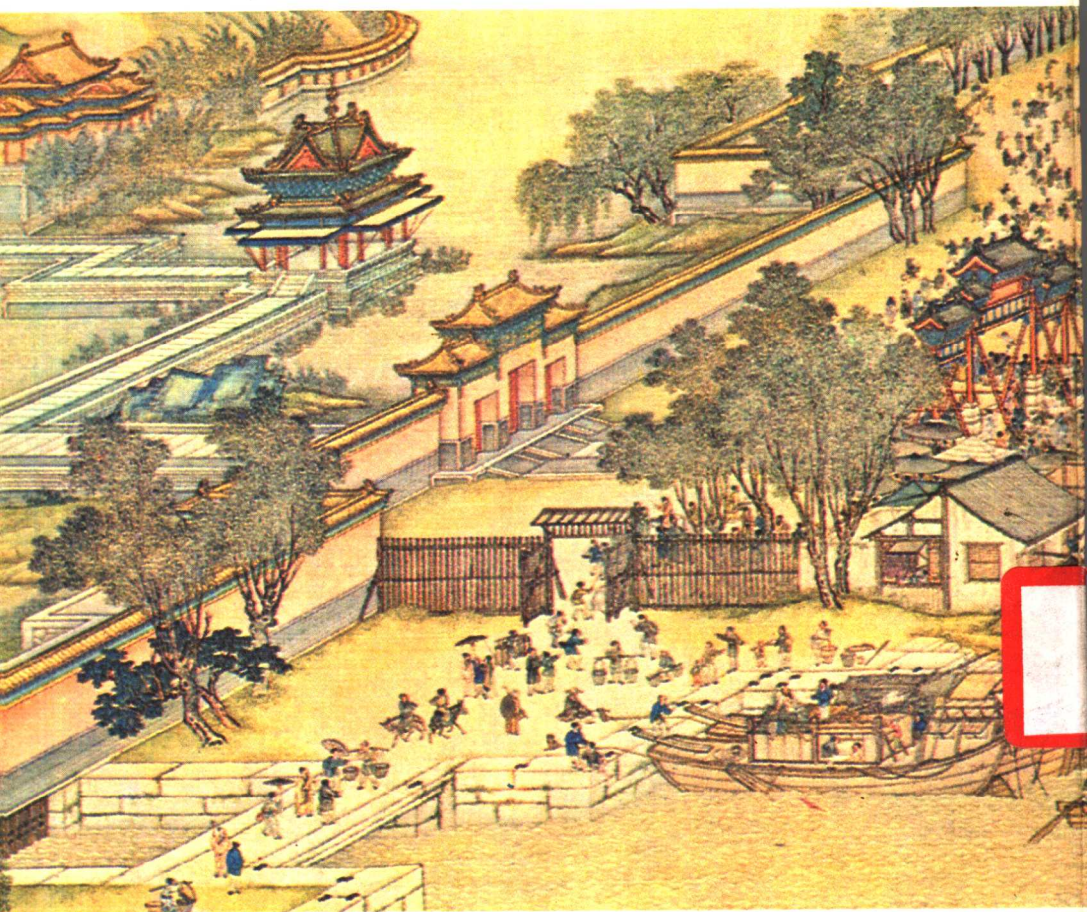


漢學論文集

號專會論討說小清晚 集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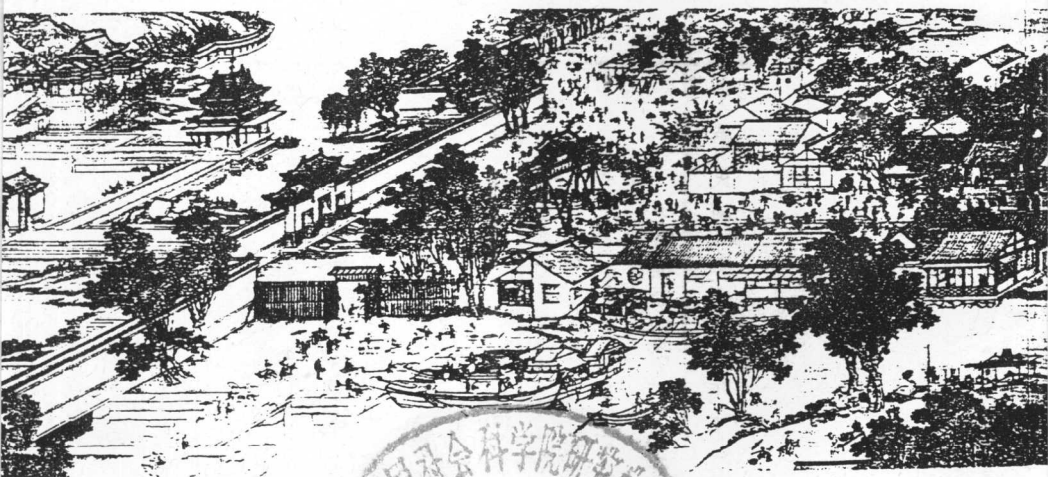
編主系文中學大治政立國
所研中



漢學論文集

號專說小清晚 集三第

編主系文中學大治政立國
所研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文庫出版社
行 印

SW1847/02



10032956

漢學論文集 第三集

主編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師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漢學論文集 第三集 目次

晚清小說專號

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	張玉法.....	一
晚清小說與知識分子的救國運動.....	高陽.....	三一
晚清四大小說的諷刺對象.....	吳淳邦.....	三九
晚清西洋文學之譯介.....	何欣.....	八三
晚清社會與晚清小說.....	尉天驄.....	九五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評價.....	陳幸蕙.....	一一一
論晚清的華工小說.....	賴芳伶.....	一二七
清末民初的「舊派言情小說」.....	李健祥.....	一五九
清末小說的研究在日本.....	魏仲佑.....	一九五
論晚清的立憲小說.....	林明德.....	二一五
清末民初的戲曲新風尚.....	林鋒雄.....	二五一
編後記.....		二六五

晚清的歷史動向及其與小說發展的關係

張玉法

一、前言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七、八十年間，是中國歷史脫離傳統、開始步入現代化的時代。在這七、八十年當中，歷史的發展是多方向的，其與小說的發展有關者，約有六方面：①資本主義的經濟侵掠，②西方文化的流布與擷取，③新知識份子取代舊士紳，④從政治改革的要求到種族革命，⑤開民智與興女權，⑥都市化與新聞事業的發展。本文即就此六方面加以檢討。

二、資本主義的經濟侵掠

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下半期發生於英國，十九世紀上半期傳入歐陸，十九世紀下半期傳入美洲、亞洲、非洲（註一）。在工業革命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有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初特徵，是透過新機器的應用，技術的改良，妥善的經營，使工業生產品價廉物美，以達到在自由競爭

中獲勝的目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則以銀行資本向工業界入侵，以達到以少數銀行控制各種工商業之目的。於是由貨物輸出到資本輸出，遂爲資本主義自然膨脹之結果（註二）。

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初爲英國，次爲歐陸之法、德等國，再次爲美、日等國。資本主義國家向外擴張，初以通商、傳教爲主，通商、傳教受阻，則繼以軍事侵略。軍事侵略獲勝之後，即獲取更多利權。一八四〇年英國假鴉片貿易受阻爲名，侵略中國，勝利之後，中國割讓香港，並開上海等五口通商，鴉片貿易自然解禁。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英、法兩國假通商、傳教受阻爲名，侵略中國，勝利之後，中國開漢口、天津等十二口通商，割讓九龍於英，允許外人在內地傳教，允許外國軍艦商船至內河航行，洋貨進口關稅議定值爲抽五，另繳百分之二點五的子口稅，可免受釐卡的限制。在擴展通商、傳教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復對中國的藩屬加以掠奪。一八八四年，法國爲控有安南，向中國開戰，勝利之後，法國獲得安南、獲得陸路通商的權利、獲得華南鐵路建築的權利。一八九四年，日本爲控朝鮮，向中國開戰，勝利之後，日本獲得朝鮮，日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工廠，中國開放重慶等四口通商。中日戰爭以後，列強見中國積弱不振，欲加以瓜分。於是德國劃山東爲勢力範圍，法國劃雲南爲勢力範圍，日本劃福建爲勢力範圍，俄國劃東三省爲勢力範圍，英國劃長江流域爲勢力範圍。英、美兩國懼列強在中國發生衝突，影響商業利益，乃於一八九九年倡導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一面要求各國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一面要求在每個勢力範圍內，各國通商投資不受干涉。因爲此一政策符合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遂爲各國所接受。雖然次年曾因義和團之亂引起八國聯軍，八

國聯軍勝利後，列強在中國獲得更多的利權，並使京畿的國防盡撤，各國仍然聲言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此後，中國在列國勢力均衡下，維持了十一、二年的安定，晚清小說的發展，主要在這個時期。

資本主義國家的勢力侵入之後，中國的工業、礦業、交通、運輸、金融、進出口等方面的經濟活動，無不受其影響，或受其控制。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出現兩種人，一種人進入外國的商行，爲其服務，從中獲取報酬，或利用機會賺取利潤，此即買辦。另一種人，與外商處於競爭對抗狀態，包括官僚、士紳、新知識份子和新興的商人在內，提倡商戰，要求收回利權，努力於自辦實業，或假商戰或自辦實業之名，圖謀私利。這兩種人，都出現在晚清的小說中。

中外商業在鴉片戰爭以前，原由廣州的公行（十三洋行）壟斷，鴉片戰後，開五口通商，公行制度廢除，外商直接與中國商人貿易，乃大量雇用中國人爲媒介，而有買辦行業的興起。所謂買辦，爲洋行中的華籍經理，負責該行與中國人之間的交易，他們替洋行物色中國籍的辦事員、管理中國籍的辦事員、替洋行管賬、提供市場消息、爲中國銀行的票據作保證、並幫助外國經理與中國方面辦交涉。外國商行在中國所作的經濟活動甚爲廣泛，以英國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爲例，從一八三二年創立，迄於一九〇四年間，所經營的事業有進出口、運輸、倉儲、保險、銀行、工業、投資、電力等（註三），自然需要許多中國人員的協助。

任職於洋行的中國人，很難統計，重要的買辦，據估計，一八五四年時約二五〇人，一八七〇年

時約三五〇人。買辦初以廣東人爲多，其後浙江、江蘇人漸居重要地位。在一九二〇年代著名的一百個買辦當中，浙江占四十三個，江蘇占三十一個，廣東占七個，安徽占五個，江西占一個，不詳籍貫者三個。著名的買辦，有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三年在怡和洋行任職的唐景星，有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英國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 Co.）任職的鄭觀應，有二十世紀初年曾在華俄道勝銀行任職的虞洽卿等。買辦因爲報酬、佣金優厚，又有機會從事貿易活動，極富資財。他們大量投資於中國新興的工業、礦業、運輸業（包括鐵路、航運）等，如唐景星於一八七七年投資於開平煤礦三十萬元，鄭觀應投資於各種新式工業達四十萬元（註四），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甚有貢獻。不過，他們在中國身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的時代，在中國人提倡商戰和收回利權的時代，也常被指爲「漢奸」。他們在小說中的角色，經常是醜陋的。如吳研人的「發財秘誅」，一名「黃奴外史」，即痛詆買辦階級無恥（註五）。

商戰觀念起於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業競爭的了解，如一八六二年兩江總督曾國藩謂「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十九世紀末年買辦商人鄭觀應謂「西人以商爲戰，士農工爲商助」（註六）。十九世紀中外進出口貿易在沿海競爭激烈（註七），各國更進一步在中國設工廠，企圖壟斷中國市場，乃激使官商學界起而從事商戰運動。以官僚的身份從事商戰者，如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湖總督張之洞，他們竭立倡導工業化，興辦各種企業，以抵制外人的經濟侵略。不過他們所倡導的企業，一切要接受官家的督導和控制，與商人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並違反近代自由

企業的精神（註八），所以成就不很大。以商人身份從事商戰者如鄭觀應，自謂「投身於商戰場中已三十餘年」，並謂「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卮，惟志大才疏，未酬夙願」（註九）。可見鄭觀應在商戰場上亦不順利。以學界人從事商戰者如南通狀元張謇，於甲午戰後在南通辦大生紗廠，並種棉花、創電力、辦銀行、興墾牧。由於他出身士紳，可免除官方的騷擾，又注意關係企業的經營，頗獲成功（註一〇）。

在地方官及商學兩界人士的倡導下，商戰觀念普遍為關心中國富強的人士所接受。一九〇三年清廷成立商部，一九〇六年改為農工商部。一九〇三年頒訂公司法，一九〇六年頒訂破產法，各大城市的商會也相繼成立，使保護商業走向合法化和合現化。清廷鼓勵商戰更具體的做法是一九〇六年十月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前夕所頒布的勸商章程，此章程對投資大加獎勵，規定投資現代企業二十萬元以上者封一等子爵，另有二等子爵、三等子爵、一等男爵、二等男爵、三等男爵、三等卿、四等卿、五等卿、六等卿、三品銜、四品銜、五品銜等規定。在中國歷史上，爵位多封賜予有軍功者，清廷將之封賜給興辦新式企業者，可以看出其着重商務、獎勵投資之誠意（註一一）。

在言論鼓吹和政府獎勵下，光宣年間出現一片興辦實業的熱潮。大部分人在默默耕耘、刻苦奮鬥，小說中却甚少以此作為題裁。倒是少部分假收回利權、創辦實業、提倡國貨之名，中飽夥友資金，招搖撞騙者，為小說家所譴責，作為諷刺的對象。如姬文所寫的「市聲」（註一二）。

三、西方文化的流布與擷取

隨着西方商務和傳教事務進入中國，西方文化開始在中國流布。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部分是由外人傳入的，部分是由中國人自己擷取的。外人傳入西方文化，除商務和教務本身的勢力和影響外，主要有三個管道：其一為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其二為外人在中國所辦的報刊，其三為外人在中國所組織的文化團體。

外人在中國所組織的文化團體，以廣學會最有名。一八七七年，在華新教傳教士第一屆大會決議組織「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由韋廉乃(Rev. Alexander Williamson)任秘書。一八七七年益智書會解散，韋廉臣另組「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一八九四年該會中文名稱改為廣學會，一九〇五年該會英文名稱改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廣學會直到一九四三年始與其他團體合併。該會以出版書刊、介紹西方文化、鼓吹中國改革為目的，會員在一八八八至一九〇五年間由二、三十人增至二百五十餘人，以傳教士為主，亦有外交人員、稅務人員及商人參加，清末先後任督辦者有韋廉臣、慕維廉(W. Muirhead)、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一八九七至一九一一年間出版有宗教性的書籍八十五種，二六〇、二五〇冊；非宗教性的書籍二三八種，六九二、八五六冊。非宗教性的書籍包括

法政、財經、外交、教育、史地、社會、人文、傳記及自然科學各方面（註一三）。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西化，自然有很大的影響。

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報刊甚多，英文的以「北華捷報」、中文的以「萬國公報」最有名。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於一八五〇年創於上海，係英文週刊。影響於中國人者較少，此處不多介紹。萬國公報亦在上海發行，係月刊，由創刊於一八六八年的「教會新報」演變而來。教會新報為週刊，一八七二年八月改名教會新聞，一八七四年改名「萬國公報」後，改為月刊。由林樂知（J. Allen）主持。萬國公報發行九年後一度停刊，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復刊，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註一四）。萬國公報在復刊之初，每年總發行量不過萬餘份，其後發行量漸增，可知者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七年間，每年總發行量從二萬餘份至五萬餘份不等，十一年的總發行量為四〇六、七二二份（註一五）。萬國公報的內容除教義及傳教活動外，以介紹西方的政教、風俗為多，並有大量文字鼓吹中國改革，財經方面如建議設立銀行、廢除厘卡、改革稅制和幣制，政治方面如建議改革吏制、主張親英抗俄，教育方面如建議改革八股考試、建立新學制、增加留學人數等，對清末維新份子如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有很大的影響（註一六）。

外國教會在中國所辦的學校，一八六三年時的講書堂、義學及學堂數為三十九，一八六六年時的學生數為三、二四人，其後迄於一九一〇年代（民國初年）的四十年間，學校數增至五、〇三四，其中初小四、一三八所，高小四三六所，中學一七六所，大學三十八所，師範學校四十所，神學校一

四三所，職業學校五十所，醫學堂十三所。學生人數，初小八〇、七六二人（其中女生二八、〇六三人），高小二〇、四八三人（女生九、九四二人），中學一〇、〇四一人（女生二、八〇八人），大學二、八三六人（女生二二二人），師範九二九人（女生一八七人），神學校三、五二四人（無女生），職業學校九三二人（女生八六六人），醫學堂四四一人（女生十二人）。學校主要的分佈地區是福建、廣東、山東、四川、浙江、東三省及雲南。民國初年，教會學校學生人數（一一九、九四八），約爲中國公立學校學生人數（一、六一〇、五三五）的十三分之一（註一七）。

中國人主動擷取西方文化，主要有三個途徑：其一、翻譯外國書報，其二、設立學堂，教授現代知識，其三、派遣留學生，分赴各國留學。

在翻譯外國書報方面，約可分爲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一五八四—一七九〇），主由各國在華耶穌會教士翻譯，先後參與翻譯工作的耶穌會教士至少八十人，翻譯的書籍四三七種，其中百分之五十七屬於天主教義，百分之三十屬於自然科學，百分之十三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高一志（Vagnoni）編譯的「西學治平」（一六三〇）是第一本有系統地介紹西方政治學的中文書，而艾儒略（Julius Aleni）所編譯的西學凡（一六二三）則介紹了歐洲各大學的課程。第二個時期在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一八一〇—一八六七），主由各國在華基督教士翻譯，先後翻譯的著作七九五種，其中百分之八十六屬於基督教義，百分之六屬於自然科學，百分之六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百分之二屬於其他方面，麥都士（Walter Henry Medhurst）編譯了一本東西比較的歷史，

題名「東西史記和合」(一八二九)，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編譯的一本介紹美國地理的書，題名「亞美利哥合省國志略」(一八三九)。第三期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一八五〇—一八九九)，由中國政府和私人所翻譯的書共五六七種，其中自然科學占百分之七〇·四，人文及社會科學占百分之二一·七，其他占百分之七·九。一八四〇年前後兩廣總督林則徐找人所翻譯的西方書報，部分編入魏源的「海國圖志」(一八四四)；一八七〇年代，丁韋良(William A.P. Martin)主持同文館時編譯了一本「萬國公法」。從事翻譯的政府機構有同文館、廣方言略、江南製造局等，私人機構有傅蘭雅所創設的格致書室(一八八四)、上海文化界人士所創設的譯書公會等。第四個時期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一九〇〇—一九四〇)，譯書漸多，教士的角色亦漸不重要。在一九〇二—一九〇四年間所譯的五三三種著作中，自然科學占百分之三一·五，人文及社會科學占百分之六一·四，其他占百分之七·一。重要的譯著有嚴復的「國富論」(一九〇二)、「群己權界論」(一九〇三)等。大概說來，甲午戰前所譯的書以來自英國者爲多，甲午戰後以來自日本者爲多，到一九五〇年後，中國大陸的譯書，則以來自俄國者爲多(註一八)。

設立學堂，傳授現代知識，由國人自辦者，始於一八六〇年代，初以專門學堂爲主，如京師同文館(一八六二)、上海廣方言館(一八六三)、廣東方言館(一八六四)、上海機器學堂(一八六七)、天津水師學堂(一八六七)、天津武備學堂(一八八五)、廣東水陸師學堂(一八八七)、威海衛水師學堂(一八八九)、天津醫學堂(一八九四)、南京水師學堂(一八九四)、南京陸師學堂(一八

九五）、湖北武備學堂（一八九五）等。至一九〇二年以後，始建立現代學制，設立各級學校，有初等學堂、中學堂、專門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師範學堂、實業學堂等種。在教育內容上，大量加入西學課程。初等學堂即小學，學生人數，一九〇七年爲九〇〇、三六四（或謂九一八、五八六）人，一九〇九年爲一、四九二、一四七（或謂一、五三二、七四六）人。中學堂即中學，學生人數，一九〇七年爲三〇、七三四（或謂三一、六八二）人，一九〇九年爲三八、八八一（或謂四〇、四六八）人。專門學堂，相當大專程度，以語文、軍事、機器、醫藥等爲主，可分爲文、理、法、醫、藝術五類，學生人數，一九〇七年九、四五二人，一九〇九年一五、六二〇（或謂二〇、六七二）人。高等學堂（大學堂）相當於大學，學生人數，一九〇七年爲二、八三八人，一九〇九年爲四、一二七人。師範學堂分兩級，即優級師範學堂和初級師範學堂，優級師範學堂造就中學堂及初級師範學堂師資，相當於大學程度；初級師範學堂造就高等小學及初等小學師資，相當於中學程度。兩種師範學堂的學生人數（京師未列入統計），一九〇七年爲三六、〇九一人，一九〇九年爲二八、五七二人。實業學堂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級，初級相當高等小學程度，中級相當中學程度，高級相當大專程度。可分爲農業、工業、商業、商船等類。實業學堂的學生人數，一九〇九年一六、六四五人（註一九）。

派遣留學生，始於一八七二年派第一批幼童（十二至十六歲）留美，迄一八七五年，共派四批一二〇人，由陳蘭彬、容閔負責辦理。後受美國排華運動影響，加上留學委員吳子登從中破壞，於一八八一年全部撤回（註二〇）。這批留學生中，日後有二十二人在外交界服務，二十一人在海軍服務，

十三人在鐵路和工程方面服務（註二一）。庚子以後，留學風氣大開，湖北、四川、直隸、江蘇、浙江、廣東等省曾派數十人留美，迄一九〇八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清廷利用庚款派留學生赴美，一九〇九年派四十七人，一九一〇年派七十人，一九一一年派六十二人。這些公費留美學生，大部分習農、工、商、礦，只有少數人習法政、財經、師範（註二二）。

留歐方面，一八七七一—一八九七年間，福州船政學堂曾派四批學生留學英、法等國，共八十五人，返國後多服務於海軍（註二三）。其他零星派遣者，如一九〇三年管學大臣張百熙派京師大學堂學生十六人留歐，兩江總督張之洞派陸師學堂學生八人留德，湖北巡撫端方派湖北各學堂學生留德，一九〇四年南洋公學派該校畢業生十二人留比，一九〇五年蘇州高等學堂派學生七人留比，一九〇六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派北洋大學堂學生五人留比，保定速成學堂學生五人留德，一九〇七年京師大學堂派學生四人留學英、法等（註二四），不備舉。

日本留學，始於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清廷始令各省選派學生留日，私費前往者亦多（註二五）。或習師範，或習法政，或習陸軍，或進入普通中學。歷年留日學生人數，一九〇〇年三〇〇人，一九〇二年六〇〇人，一九〇四年三、〇〇〇人，一九〇六年一五、〇〇〇人，一九〇八年七、〇〇〇人，一九一〇年二、〇〇〇人，一九一二年一、四〇〇人（註二六）。

前述西方文化的流布和擷取，直接影響到中國教育的改革，間接激起了經濟（商戰）、政治（改革和革命）、和社會（開民智、與女權）運動，而經濟變遷激起了人口流動和都市發展，政治、社會

運動和都市發展又激起了新聞事業的興起。這些，均與小說的發展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其關係尤大者，則爲在吸收西洋文化的過程中，對外國小說的翻譯。林紓一生翻譯小說近百種，約有一半出版於清末，法國小仲馬（A. Dumas, fils）的「巴黎茶花女遺事」（1903）、美國史活夫人（Mdm. Stowe）的「黑奴籲天錄」（1905）等，都被他介紹進來。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周樹人和周作人兄弟，在清末也譯印了「域外小說集」（1909），書中包括俄、英、法、丹麥等國的小說名著（註二七）。這些，對於中國小說的創作，自然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四、新知識分子取代舊士紳

傳統中國社會，分爲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士是讀儒家經典的知識份子，在唐、宋、明、清時期，特指獲有進士、舉人、貢生、生員等功名的人。士居四民之首，爲社會的領導階層。士多由務農者上升而來，農爲經濟之本，國家稅收多來自田賦，故在歷史上士與農爲社會的基礎，也是國家權力的基礎。近代以來，受資本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因爲講求商戰的關係，工商地位大增，農民的地位相對減低，而飽讀中國儒家經典的士，由於不具近代新知識、沒有應付新環境的能力，逐漸沒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知識份子。這是近代中國社會最大的轉變。

科舉制度下的教育制度，以清代而論，有志於學者，先入家館、私塾或書院，書院較具規模，多由地方官紳合辦，地方政府所辦的學校，縣有縣學，府有府學，爲同等級。縣學和府學每三年招考一

次學生，叫童試（又叫小考）。童試要經過三次考試，縣考由縣官主持，縣考通過之後，參加府考，府考由知府主持；府考通過之後，參加院考，院考由學政主持。院考獲錄者，即分別入縣學或府學，謂之生員（秀才，諸生）。各縣秀才名額，大縣三、四十名，中縣二、三十名，小縣十數名或數名。生員依其等第有五種，初入學者爲附生，學政第一年歲考，成績優良之附生可補增生（廩生之增廣名額），增生可補廩生（給予俸末）。附生、增生、廩生第二年參加學政所主持的科考，通過者始准參加第三年之鄉試。另一方面，清廷經常從生員中考取優秀者，至國子監讀書，或授以下等官位，考取者稱爲貢生。貢生十二年一考，由學政至各府州縣考選，府學二名，縣學一名。優貢三年一考，以省爲單位，學政主之，考生由各府、州、縣就生員中保舉。錄取者爲優貢，次年送京參加朝考，朝考一等可授知縣。副貢爲鄉試中的備取生，每正取五名，備取一名，但不能參加會試。凡廩生食餼十年以上，歲考一等者，由學政於每歲或每數歲選一、二名，貢之京師，入國子監讀書，或僅有其名，並不入監讀書，謂之歲貢。有歲貢之年適國家有慶典，如皇帝登基、大婚、萬壽，即名爲恩貢。貢生、優貢、副貢、恩貢、歲貢，謂之五貢。此外廩生供職軍中者叫准貢，廩生納貲捐貢者謂之廩貢，增生納貲捐貢者謂之增貢，附生納貲捐貢者謂之附貢，布衣納貲捐貢者謂之例貢。國子監爲國家最高學府，入監肄業者名監生（太學生、國學生）。監生有四種：由貢生入監者名優監，聖賢後裔及八旗漢文官學生考取入監者名恩監，殉難官吏之子及四品以上官員之子保送一人入監者名廕監，納貲捐監並不入學者名例監（註二八）。